一

参 加 红 军

第一次参加战斗

1913 年 11 月，我出生在江西省兴国县。兴国，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光荣传统的地方。那里曾经养育了无数中国革命的优秀儿女。仅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，全县 23 万人中，就有 8 万人参军，为中国革命牺牲的烈士有三万多名。

我家住在东村区澄江乡甘源村。家中只有两间土屋和几块贫瘠的土地，终年吃不饱，穿不暖，生活非常困苦。我的童年充满着辛酸和眼泪。我的父母都是农民，像中国许许多多农民一样，他们面朝红土背朝天，年复一年地把血汗全部倾注在田里。我六岁那年，父亲得病去世了。我幼小的心灵刻上了痛苦的痕迹。父亲去世后，生活的负担全部压在了母亲的身

上。我在家中排行第三，上有两个姐姐，下有一个妹妹。生活压得母亲抬不起头来，不久，她在饥寒交迫中得了重病，我 9 岁那年，母亲又含着眼泪离开了我们。我们四个孩子围在母亲身旁哭得死去活来。父母双双病故，家里失去了顶梁柱，我们家也散了。一个姐姐匆匆出嫁，另一个姐姐给人当了童养媳，我与妹妹被三叔家收养起来。这时我已经懂事了，我不能吃闲饭，我便为三叔放牛。也许三叔看我父母早亡，决心要把我培养成人， 12 岁那年，三叔将我送进一家私塾念书。可是进私塾每年要交几担粮食，三叔家负担不起这笔“学费”，两年后我就失学了。我又回来放牛、捡柴火。

1927 年，蒋介石叛变革命，大肆屠杀共产党人，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。毛泽东同志带领湖南农民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了井冈山，以井冈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。

1929 年 4 月，红军主力先后攻克兴国、宁都两个县城。随后在当地消灭地主武装，发动与组织群众参加革命。当时，在我家乡附近，活跃着一个红军团，他们积极宣传马列主义、宣传苏维埃，还把我们这些穷小鬼组织起来。当我看到地主戴高帽子游街时，感到非常新鲜，非常痛快。在革命高潮中，我参加了少先队。当时兴国县的少共书记是肖华同志。他

组织我们少先队员替红军和游击队站岗、放哨，还练大刀、刺杀（用梭镖）。这年夏天，红色首都瑞金召开了各县少先队比武表演大会，我们兴国县代表队取得了好成绩，被评为“模范少先队”，受到了江西少共中央书记张爱萍的表扬。

红军深深地吸引着我。虽然我还不很懂事，有很多道理不明白，但我幼小的心灵有了一个坚定的信念：我要参加红军，一定要参加红军！三叔觉得我年纪小，舍不得放我走。经过再三恳求，三叔答应了。但红军要不要我呢？我又跑到区里问，他们说：区革命委员会有号召，14 岁以上，45 岁以下的工农都可以参加军队，少先队员要做模范。但他们又说：你年纪不大，长得矮小，先参加游击队吧！于是我报名加入了兴国县游击大队。记得当时我才 15 岁，个头儿没有枪杆高。

参加游击队以后，我随队伍辗转兴国。当时，我惟一的心愿是同大人一起打仗。终于，机会来了。1929 年 12 月的一天，游击队得到情报，说有二百多名白匪驻扎在兴国县的西北部蛇布杰村。于是，在队长的带领下，全体游击队员冒雪快速行军，将敌人包围起来。天黑后，游击队发起了进攻，先是鸣枪，然后齐声呐喊，正躲在村子里烤火的二百多名白匪听到枪声和喊声，以为红军大部队来了，躲的躲，逃的

逃，当场被消灭一部分。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参加战斗，心里怦怦直跳。但脑子里什么杂念也没有，只顾随大队人马一起往前冲。一个白匪兵跪在地上，我便跑过去缴了他的枪，抓了俘虏。通过这次战斗，我的胆子逐渐大起来了，再也不害怕了。

活捉张辉瓒

1930 年秋，我们正在农村发动群众筹款，突然接到上级要各路红军集合的命令。原来，蒋介石调集了约十万人的兵力，对以江西为中心的中央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“围剿”。

敌“围剿”前线总指挥张辉瓒为先头部队，他率领号称蒋军主力的“铁军师”向红军根据地发动了进攻。12 月 29 日，窜到了赣南的龙冈。

红军总部发现张辉瓒孤军深入，即命令红三军、红十军为左路，沿君埠向龙冈前进；红四军、红三军团为右路，沿上固、下固向龙冈进发；活动在兴国的独立师由南向北迂回到敌后去。当晚，红一军团由宁都小布秘密西进，我们左路红三军于 30 日早晨占领木坑以北地区和亭子岭主要阵地，并向龙冈前进，迅速完成了对张辉瓒主力十八师的包围。

30 日清晨，敌以十八师五十二旅为先头，师部及第五十三旅随后，由龙冈向五门岭推进。上午 9 时

许，敌五十二旅在龙冈以东小布以西与担任主攻的我红三军七师相遇。在师首长指挥下，我师迅速抢占有利地形，居高临下给敌人以迎头痛击。

在激烈的战斗中，我率领班内有枪的战士朝敌人猛烈射击，让没有枪的战士用石头向山坡上的敌人砸去。在我七师的打击下，敌人有的在枪声中倒下，有的被石块砸破了脑袋，纷纷溃退，不少敌人钻进了山上的油茶树林中，因为在雾中辨不清方向，抱头乱窜。

下午，红四军和红三军团分别从龙冈东北和西北方向迅速斜插过来，把张辉瓒紧紧锁在“口袋”里，包围圈越来越小，敌军越来越乱。

4点左右，红军总部发出了总攻信号，霎时间，嘹亮的军号声起，只见漫山遍野是红旗，4万红军战士奋勇冲向敌军，气势壮观，“活捉张辉瓒”的口号声响彻天空。在红军的打击下，敌师部被捣毁，红军缴敌各种枪支九百多件。

当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押着一群群俘虏向龙冈镇集中时，惟独不见张辉瓒。原来，红军发动总攻时，张辉瓒见势不妙，换了一件士兵的上衣，又抓起自己的狐皮大衣披在身上，一边命令卫兵顶住，一边只身逃出了师指挥所，拼命向万功山的油茶树林中钻去。在树林深处的草丛中，他跳进一个土坑内，用茅草盖

在头上。当红军战士搜到这片油茶树林时，发现了地上的狐皮大衣，有个战士往里一摸，还热乎乎的，于是继续搜索，找到了土坑。十几支枪口对准土坑大喊：“谁？快上来！”张辉瓒上身穿一件士兵上衣，紧绷在身上，钮扣也扣不住，下身却穿着一条黄哗叽军裤，冻得索索发抖。他称自己是“书记官”，想蒙混过关。红军战士不知书记官有多大，叫来一个俘虏，俘虏一看就说他是师长张辉瓒，于是这位“铁将军”师长无可奈何地低下了头，做了红军的俘虏。

活捉张辉瓒的消息，一下子在军民中传开了。大家奔走相告：“前头捉了张辉瓒啦！”

在第一次反“围剿”开始的时候，我向连队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。战斗中，我冲锋在前，不怕牺牲，赢得了同志们的好评和组织的信任。1931 年 2 月 1 日，连队党支部同意接收我入党。党支部讨论我入党那天，队伍集结在兴国白沙地区，当时，共产党组织是秘密的，入党也是不公开的。排长曾兴富秘密找到我，说他愿意做我的入党介绍人。第二天，组织委员又找我谈了一次话，我向他谈了对党的认识。晚上，在油灯下，我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那时，我刚好 18 岁。

“我们也有大炮啦”

1931 年 4 月 1 日开始，蒋介石在第一次“围剿”失败后，又命何应钦为总司令，调集 20 万兵力，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“围剿”。这时候，红军人数比第一次反“围剿”时略有减少，只有三万多人，朱总司令、毛总政委指挥红军继续采取“诱敌深入”的战略方针，并根据敌人有强有弱的情况，决定先找敌人力量薄弱的王金钰的第五路军开刀。

4 月 24 日，红军部队从宁都、广昌、石城地区出发，总部开到王金钰部队所在地东固，主力红军在总部所在地周围集结；在根据地外面，牵制敌人的游击队也出动了，只等和王金钰的部队展开决战。可是，王金钰的部队一直缩在碉堡里不肯出来，各部队只好等待，寻找时机。

5 月 15 日，敌军 9 个师进至兴国城岗、永丰潭头、沙溪、宁都东韶、头坡一线，其中第五路军右翼第二十八师和第四十七师一个旅，分两路向红军进犯。红军立即接敌迎战，按照计划，5 月 16 日，红军总部由东固向东进发。毛泽东、朱德、陈毅也在行军行列中。总部的队伍走了十多里路，来到一个群山环抱的小山村。这时 3 个老乡跑来报告：“敌人朝这边来了，只有三四里路！”朱德总司令当机立断拔出

驳壳枪，带直属队和警卫连迎了上去。毛泽东总政委带了电台、通信排迅速登上山顶，抢先占领了制高点，等敌人走到距离三四十米时，朱德总司令一挥驳壳枪，先撂倒两个，接着，直属队一阵排子枪，打得敌人丢下几具尸体，其余的向后逃跑了。不一会儿，敌人以两个营的兵力反扑过来。朱德指挥部队打退了敌人的几次反扑，然后向山顶撤退。

敌人越来越多，进攻的火力也很猛。眼看弹药也快用光了。为了节省弹药，毛泽东和朱德指挥大家用石头打。在这危急关头，左边山头响起了冲锋号，接着一阵子弹向敌人射去。原来，当王金钰的一个师从碉堡里钻出来后，立即遭到了红三军团伏击，一下被打垮了，其中敌一个旅企图向西逃跑，没想到与红军总部碰上了，被拖住打了一个多小时。这时，红三军团追上来，一军团的红四军也赶到了，将这一股逃敌四面包围，迅速歼灭。

5月19日上午10点，总部下达了攻击命令，红三军、红四军向敌人发起了猛攻。这时，我已在红三军担任排长，率领全排奋不顾身地向前冲击。敌人企图还击，子弹嗖嗖地在我们耳边呼啸。红军猛烈进攻，一下子把敌人打得七零八落。敌人连山炮也来不及拖走，就狼狈逃窜。敌军溃逃时，前边碰上一条河，浮桥已被冲垮，敌兵挤在河边，逃又逃不脱，打

也不敢打，只好缴械投降。

这一仗，红三军、红四军全歼敌第四十七师一个旅残部和四十三师一部，缴获各种枪支四千余支、山炮两门和一百多发炮弹。我们摸着缴获的大炮，激动不已。排里的几个战士高兴地跳着说：“这一下我们也有大炮啦！”

黄军长牺牲了

第二次反“围剿”胜利后，红军集结在闽西北开展地方工作和休整。这时候，我因患痢疾，全身瘫软，住进了红军后方野战医院。

红军第四后方野战医院设在江西省境内的石城县。医院的条件十分简陋。我住院后每天吃熬制的草药，身体慢慢好了起来。

一天，连里派人来看望我时说：“曾副指导员（二次反“围剿”后我被任命为副政治指导员），第三次反‘围剿’开始了，部队马上要转移。”听到这个消息，我顾不得病尚未痊愈，便心急如火地赶回了连队。

从 1931 年 7 月 1 日起，蒋介石对赣南、闽西中央根据地进行的第三次“围剿”开始了。为了消灭红军，蒋介石自任总司令，率领 23 个师 3 个旅，共 30 万人。兵分三路，采用“长驱直入”战略，企图击破

红军主力，捣毁根据地。

与此同时，红军也积极调整部署，大约在 7 月 10 日前后，各路红军从闽西北的建宁地区出发，急行军绕道安远圩、宁化、长汀、瑞金， 22 日前后到达江西省于都县以北的银坑、琵琶垄地区，同由湘赣根据地来的红军第七军会合。 28 日转移到兴国的高兴圩地区集中。

敌人进入根据地后 20 天，一直没有找到红军主力。7 月底，当敌人发现红军主力在兴国高兴圩地区后，并判断红军西渡赣江，于是分路向西南疾进，企图压迫红军到赣江边而消灭之。 8 月初，敌人有 6 个师进到吉安、富田、兴国、崇贤、兴国城一线，这股敌人战斗力较强，不好打。而由东向兴国莲塘、良村方向行进的敌四十七师、五十四师战斗力较弱。于是，红军总部命令各路部队抓住战机，突然向进至莲塘之敌发起攻击，歼敌第四十七师第二旅和一个营，打死旅长谭子钧，取得了初战胜利。

我红三军第七师的任务是打敌后路军。莲塘战斗后，红一方面军继续迅速北进，与敌第五十四师一个旅遭遇，歼其一个团，毙敌旅长张銮绍，残敌向良村逃窜。我红三军追到良村，歼敌五十四师师部和两个旅大部，毙敌副师长魏我威、师参谋长刘家谋等，残敌逃向龙冈。

红军继续向东北挺进。 8月 11 日，第三军团和第七军进行了黄陂战斗，共歼敌四个团，俘敌四千多人。莲塘、良村、黄陂三战三捷，缴获敌枪支一万多。这时，敌人才找到了红军主力，于是敌各路人马向黄陂等包围过来，而且包围圈越来越小，情况非常危险。朱总司令、毛总政委决定，主力红军向敌人布防最强的西面突围，命令红十二军向相反方向把敌人引开。

夜间，红军主力乘黑暗在龙冈、良村之间十公里两路敌军的接合部偷越过去，向西南疾进，突出敌包围圈，到达兴国东北 的白 石，枫边地区，隐蔽休整待机。这时，敌人还蒙在 鼓里，以为红 十二军是主力，紧追不放，红十二军在赴高山险路和荆棘丛生的小道走，把一二十万敌军拖得 精疲 力尽。直至 8 月底，蒋介石才发现红军主力向 西进军准备重找红军主力决战。而此时，两万军阀利用蒋介石主力深陷江西之际，正向湖南衡阳进兵，蒋介石面对威胁，不得不下令撤兵，结束“ 围剿 ”。

战斗结束后，黄公略军长率我红三军开赴瑞金。途经江西吉安东固六渡凹山谷时，遇到了敌机追击。那种上下两层翅膀的飞机飞得极低，飞机上备有机枪向地面扫射。当黄公略军长指挥部队转移时，突然遭到飞机袭击，子弹打中了军长的胸膛。这时，军长离

我们只有一百多米，我和连长、指导员及几个战士急忙奔过去，扑向军长，可是已经晚了。殷红的鲜血从黄军长胸口涌出，浸透了衣服，黄军长已经说不出话来了。大家呼喊着“军长”、“军长”，黄公略军长慢慢地闭上了眼睛。

黄公略军长是一位资历很深的红军高级干部，曾在黄埔军校学习，先后参加过广州起义、平江起义。他在红三军当军长时，经常深入到干部战士中间，战斗中冲锋陷阵，深受大家爱戴。他的牺牲是革命事业的一大损失。我们轻轻地把军长抱到大树下，全体脱下军帽致哀。我的心情无限悲痛，眼眶中充满泪水，和大家一起握紧拳头宣誓：“坚决消灭白匪，为黄公略军长报仇！”

9月17日下午，我们红三军全军在兴国莲塘附近的水头庄，举行黄公略军长追悼大会。会场庄严肃穆。毛泽东同志满怀哀痛，亲笔撰写了一幅挽联，悬挂于会场两侧：

广州暴动不死，平江暴动不死，如今竟牺牲，堪恨大祸从天降；

革命战争有功，游击战争有功，毕生何奋勇，好教后世继君来。

为了纪念黄公略军长，从此，泰和县改称为公略县。

进“红大”学习

1933 年 9 月开始，蒋介石在美、英、德、意等帝国主义的支持下，集中 100 万兵力，对各革命根据地和各路红军发动了第五次“围剿”。由于临时中央排斥了毛泽东对中央红军的正确领导，推行军事冒险主义，提出“御敌于国门之外”、“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”的错误口号，致使红军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一开始就陷入了困境。

1933 年 9 月 25 日，敌周浑之的三个师由南城、硝石向黎川发起猛攻。由于主力红军分离作战，全部分散在外，黎川红军的兵力只有 70 人的一个教导队。在无法坚守的情况下，当时任建黎泰警备区司令兼政委的肖劲光命令部队和群众撤出黎川。军委发现黎川失守，急令我们红三军从福建返回，北上夺回黎川。但我们自延平、将乐、顺昌前线撤回泰宁时，已是十月初了。在随后的两个多月中，我们三军团与其他军团一起，先后经历了洵口、硝石、资溪桥、泸湾八角亭、云盖山和大雄关等战斗。不仅没有在根据地之外歼灭和阻止敌人，反而丢失了若干地方，消耗了自己的力量，使自己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。这是临时中央实行“左”倾军事冒险主义的结果。对这种“左”倾冒险主义，许多同志提出了批评意见，但往往受到无

情打击。滕代远被调出三军团，彭德怀被免去中革军委（中央军委）副主席职务。“左”倾冒险主义者又以“黎川失守”为罪名，将肖劲光抓起来，交法庭公审，并准备杀掉他。由于毛泽东坚决反对，王稼祥几次拒绝签字，才幸免于难。

1934 年 1 月，蒋介石集中三十多个师，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。

1934 年 4 月 10 日，敌北路军陈诚将 11 个师（其中五个甲种师），调到南丰以南的白舍、瑶坡地区，在抚河上游的盱江南岸，向广昌进攻。这时，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李德不顾红军连续作战、伤亡很大和急需休整的情况，集中一、三、九军团 9 个师的兵力，并以三军团为主力，构筑所谓“永久工事”，进行广昌保卫战。他们提出：“广昌就是中国的马德里”、“为保卫广昌而战，就是为保卫中国革命而战”的错误口号，企图在广昌地区同敌人进行大规模的阵地堡垒战。

4 月 11 日，盱江东西两岸敌人同时向广昌进攻。我红三军团向敌人进行反击。敌军在飞机支援下，以猛烈的炮火，连续轰击巴掌形的我军阵地，整天炮声隆隆，枪声不断。保卫战打得英勇、顽强、悲壮。敌人疯狂地向红军阵地扑来，光我们十二团二连守卫的阵地上，敌人一天就发起多次冲锋，但经过反复拼

杀，敌人均在我们机枪扫射下被打退。夜间，我们连主动出击，曾先后打掉敌人八个碉堡，后来被师里评为“夜老虎连”。

在广昌保卫战中，由于敌人天天进攻，红军遭受极大损失，三军团损失尤其惨重，全军老的连长几乎全部伤亡。我们一百多人的连队，先后阵亡八十多人，活着的干部战士一身焦衣，许多人受了伤，但阵地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中。一天早晨，军团长彭德怀来到我连阵地，他看到阵地上的惨象十分动情，对牺牲这么多的同志感到难过。他对我和连长说，你们打得英勇顽强，是好样的，要我们再坚守几天。在彭德怀同志的鼓励下，我们始终做到人在阵地在。广昌保卫战先后进行了 18 天，到 4 月 27 日，我们根据上级指示，与各路红军一起，被迫撤出战斗。广昌保卫战，虽然给敌人以重大杀伤，但红军付出了很大代价，这是一次典型的消耗战。据统计，这次战斗，红军伤亡五千五百余人，占参战兵力的五分之一。

广昌保卫战后，大约在 1934 年的 5 月上旬，组织上送我到中央红军大学学习。

红军大学设在距离瑞金城十多公里的一个叫大树下的地方。山坡上有一片茂密的松林。刚开办时，学员自己动手，建起了一排排茅草屋，因此也称为“草屋大学”。红军大学分成四个科：高级指挥科，主要

是培养师以上高级干部，当时在学习的有宋任穷，邓华、肖克等；上级指挥科，主要是培养团长一级指挥干部；上级政治科，主要是培养团政委一级的政工干部；上级参谋科，主要是培养军事机关干部。红军大学有学员三百多人，我在上级政治科学习。红大的主要课程有：马列主义常识、党的历史、政治工作、战略战术、参谋业务等等。红大的教员分为两类，一类是兼职教员，多是中央和总政治部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；另一类是专职教员，有宋时轮、周士第、苏进、冯达飞等，其中也有肖劲光同志。肖劲光同志是1922年入党的老党员，曾到苏联学习过，回国后从白区到苏区，参加过北伐战争，曾任红五军团政委，是红军的高级指挥员，由于受王明“左”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打击迫害，被撤职，开除党籍，分配到红大当教员。他忍辱负重，忠诚于革命的品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我在红军大学学习了几个月后，形势越来越紧张，由于博古、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，红军节节抵抗，节节后撤。十月上旬，敌北路军和南路军加紧进攻兴国、石城、长汀和会昌，根据地范围越来越小，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敌人第五次“围剿”已经失去了可能性。眼见根据地一天天缩小，我们每一个干部战士忧心忡忡。大家在一起议论，心情都很沉重。终

于，上面来了通知，准备实行大转移。但转移到哪里去，我们都不知道。 10 月 7 日，中央命令各地方兵团接替红军各兵团的任务，先后将第一、三、五、八、九军团从防御阵地撤下来，到瑞金、于都、会昌地区集中，从此，我们开始了突围转移。